

BuddhistRoad 出版物: 摘要

Meinert, Carmen and Henrik H. Sørensen 编: 《中亚的佛教 I: 施供关系, 合法化策略, 圣地和朝圣》, 莱顿, 波士顿: 博睿出版社, 2020 年。

BuddhistRoad (佛教之路)研究项目受 ERC (欧洲研究中心)资助, 旨在构建一种新的框架, 使人们能够理解古代中亚东部 (pre-modern Eastern Central Asia) 复杂而动态的文化相遇 (cultural encounter) 和宗教转换 (religious transfer)。该项目视佛教为这种交流的一个主要因素: 将首次系统地探讨跨区域佛教传统 (汉传佛教, 印度佛教, 藏传佛教) 与不同的地方佛教文化 (于阗, 回鹘, 西夏, 契丹) 的多层次关系。《中亚的佛教 (第一部分): 施供关系, 合法化策略, 圣地和朝圣》以 2018 年 5 月 23 日至 25 日在德国波鸿鲁尔大学 CERES (宗教研究中心) 举行的启动会议为基础, 重点讨论该项目将处理的六个主题中的前两个, 即“施供关系和合法性策略”以及“圣地和朝圣”。

(1) Vermeersch, Sem: 《谁赋予谁合法性?—论身体政治中佛教地位的合理性》, 载于 Meinert, Carmen and Henrik H. Sørensen 编: 《中亚的佛教 I: 施供关系, 合法化策略, 圣地和朝圣》, 莱顿, 波士顿: 博睿出版社, 2020 年, 第 15–39 页。

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ed/60/ed6066ce-7a8b-428f-a889-034a582413a7/meinert_sorensen_2020_buddhism_in_central_asia_i_vermeersch_offprint.pdf

摘要:

合法化的概念在概念化宗教与世俗权力的关系方面非常有用。几乎任何社会中的任何宗教都以某种方式赋予世俗权力以合法性 (或解除其合法性), 但这也是这个概念的局限性所在——它已成为一个笼统的术语, 比起其揭示的意涵反而遮蔽的更多。宗教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帮助了那些想要巩固自己权威以对抗对手的人? 如果一个宗教文本神圣化或以其他方式抬高了一个统治者, 它是否真正有助于这个统治者, 亦或只是空洞的措辞? 我们如何才能确定隐藏在修辞背后的实际权力关系? 为了重新思考合法化的概念, 在本文中, 我主要探索了之前东亚佛教王权研究中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仅仅在汉语文献中出现的像“转轮王” (*cakravartin*) 这样的术语, 就足以得出佛教在中国有助于世俗权力合法化的结论。这往往基于有一个意识形态体系或模板可以参考的假设。不过, 确实有一个文本可以被视为开创性的“合法化文本”, 即《仁王经》, 对其有多种不同的解读且在东亚各国对其应用也各有不同。然而, 在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无法找到阐明佛教合法化原因和方式的明确来源; 历史上的先例和本土文化及社会因素所起的作用似乎比经典文本更大。笔者在该领域最重要的研究进行批判性回顾之后, 仔细研究了历史案例, 以揭示在佛教赋予世俗权力合法性这一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机制。笔者主要以韩国历史上的案例与中国历史上的佛教研究结果进行比较。

(2) Forte, Erika: 《于阗供养人图像研究》，载于 Meinert, Carmen and Henrik H. Sørensen 编：《中亚的佛教 I: 施供关系，合法化策略，圣地和朝圣》，莱顿，波士顿：博睿出版社，2020 年，第 15–39 页。

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94/09/94094062-2398-498f-a668-22f8a60fab6b/meinert_sorensen_2020_buddhism_in_central_asia_i_forte_offprint.pdf

摘要：

文本证据表明，于阗佛教在其鼎盛时期（5–10 世纪）得到了王室的大力支持。在关于于阗的藏文文献中，有大量涉及于阗国王建立重要寺院的记载。汉传佛教文献中保存的地方传说也将于阗王族与佛教神迹不断联系起来。如果地方和宗教的文献明确提到了王室的供养，并将统治家族描述为佛教作为国教存在的保护者，那么对于这种供施关系，于阗的艺术史材料又会告诉我们什么？供施关系（和合法化策略）是如何通过图像，或通过被支持的寺院的雕塑和绘画装饰来体现的？一般来说，虽然壁画上出现了供养人，但由于发愿文稀少且保存状况不佳，很难确定他们的确切身份和供养目的。本文研究了于阗佛教遗迹中与两个著名的地方传说有关的图像证据：蚕丝公主的故事和瞿摩帝寺(Gomatī Monastery)的创建故事。这项研究表明，尽管没有关于供养人的明确描述和题记，但在艺术史材料中可以发现供施关系的特定方式。最重要的是，这些画作即是于阗通过图像媒介表达供施关系的“语言”。

基于此，笔者意在强调在研究中亚佛教的过程中，对考古资料（包括新旧发掘的资料）进行系统调查的重要性。这项研究即是考古学和艺术史资料与文本和语文学资料可以有效结合的证据，以填补对中亚佛教历史发展理解的诸多空白。

(3) Kasai, Yukiyo: 《回鹘的合法性策略和佛教的作用》，载于 Meinert, Carmen and Henrik H. Sørensen 编：《中亚的佛教 I: 施供关系，合法化策略，圣地和朝圣》，莱顿，波士顿：博睿出版社，2020 年，第 61–90 页。

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bb/70/bb704e80-45c9-4ceb-a6ac-ab8e3c871708/meinert_sorensen_2020_buddhism_in_central_asia_i_kasai_offprint.pdf

摘要：

从 8 世纪到 14 世纪，回鹘人经历了他们统治者合法性策略的多种变化。其信仰经历了从传统宗教到摩尼教，再到佛教的转变，对统治者们的权力的表现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本文讨论了这一时期回鹘统治者们的合法化策略的变化。

(4) Sørensen, Henrik H: 《敦煌归义军统治时期的供养人和密教》，载于 Meinert, Carmen and Henrik H. Sørensen 编：《中亚的佛教 I: 施供关系，合法化策略，圣地和朝圣》，莱顿，波士顿：博睿出版社，2020 年，第 91–122 页。

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c7/e5/c7e50b1e-05a0-48a3-b7aa-31d87fb858ce/meinert_sorensen_2020_buddhism_in_central_asia_i_sorensen_offprint.pdf

摘要：

本文强调了敦煌归义军时期(851–1036?)主要的贵族供养人与密教之间的关系，笔者以绘有作者题记的卷轴画和壁画为例来讨论这种关系。本研究还表明，敦煌的社会和政治精英们对与密教有关的习俗和实修——特别是与观音信仰有关的内容尤为感兴趣。

(5) 索罗宁：《西夏意识形态的形成：佛教和儒家思想》，载于 Meinert, Carmen and Henrik H. Sørensen 编：《中亚的佛教 I：施供关系，合法化策略，圣地和朝圣》，莱顿，波士顿：博睿出版社，2020 年，第 123–147 页。

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76/c7/76c769f7-55d9-4bcb-8251-7b2f1f1b137f/meinert_sorensen_2020_buddhism_in_central_asia_i_solonin_offprint.pdf

摘要：

本文探究了西夏帝国（约 1038–1227 年）的意识形态，主要着眼于通过几件遗存的西夏作品来重构西夏的意识形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将西夏的国家意识形态定义为佛教或儒家思想均不妥当。本文认为，西夏意识形态的核心是民族认同，而非任何具体的意识形态体系。此外，它还表明，西夏人自我认同的核心是与西夏文字系统相关的西夏仪式的理念，笔者主要从这个角度探讨了佛教和儒家思想的相对地位。

(6) Widorn, Verena：《从莲花生到郭藏巴：8–13 世纪印度-喜马拉雅的宗教施供关系再考》，载于 Meinert, Carmen and Henrik H. Sørensen 编：《中亚的佛教 I：施供关系，合法化策略，圣地和朝圣》，莱顿，波士顿：博睿出版社，2020 年，第 151–188 页。

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bb/fe/bbfe73cc-e60a-44d9-90ef-0925eb007bb0/meinert_sorensen_2020_buddhism_in_central_asia_i_widorn_offprint.pdf

摘要：

本文讨论了因学术历史研究和宗教崇拜的不同视角而导致的对供施关系真实性的不确定认识。这项艺术史研究着眼于来自西喜马拉雅地区印度境内的金瑙尔（Kinnaur）和拉胡尔（Lahul）两地的一些物品和遗迹。当地传统认为这些文物属于 8 至 13 世纪重要的佛教人士。笔者认为，这些与传说中的供养人的神秘行为有关的文物，与地形的特殊性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在该地区的神圣地理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我们的目的不是描绘出一幅历史上真实的画面，而是要探索艺术、建筑、景观以及当地的供施关系和宗教遗产概念之间的关系，且不仅仅是在现代。

(7) Wilkens, Jens：《回鹘佛教中的圣地》，载于 Meinert, Carmen and Henrik H. Sørensen 编：《中亚的佛教 I：施供关系，合法化策略，圣地和朝圣》，莱顿，波士顿：博睿出版社，2020 年，第 189–203 页。

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f3/86/f3860299-9040-4200-84d2-461ab05bc06a/meinert_sorensen_2020_buddhism_in_central_asia_i_wilkens_offprint.pdf

摘要：

回鹘佛教深植于中亚环境。迄今为止，对回鹘主要聚居区内外的宗教圣地尚未有详细的调查。本文将研究是否可以在文本资料中追溯到圣地，如果可以，则如何阐述这一概念，以及是否有特定的回鹘路径。关于研究材料的运用假设，从翻译的佛教作

品中很可能难有所获，但题记，诗歌和跋文则有可能为回鹘人对圣地是否有特殊看法的问题提供答案。

(8) Raschmann, Simone-Christiane: 《古回鹘碑铭中的朝圣者：书写一瞥》，载于 Meinert, Carmen and Henrik H. Sørensen 编：《中亚的佛教 I：施供关系，合法化策略，圣地和朝圣》，莱顿，波士顿：博睿出版社，2020 年，第 204–229 页。

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de/6c/de6c1641-73d2-4c5f-ac2d-2b662e4af437/meinert_sorensen_2020_buddhism_in_central_asia_i_raschmann_offprint.pdf

摘要：

在利用古回鹘文手稿进行关于朝圣主题的研究中，我们几乎没有遇到像中国著名朝圣者玄奘，法显或义净那样详细的个人朝圣记录。另一方面，大量内容各异古回鹘文佛经以及僧团和寺院的记录保存了下来，这清楚地表明了回鹘人广泛且相当持久的佛教取向。由于朝圣是一项重要的佛教活动，因此在古回鹘文的碑铭遗迹中寻找朝圣者的痕迹以了解他们的故事非常有价值。本文即着重于对在河西和吐鲁番地区发现的古回鹘文朝圣者碑铭进行研究，结合高昌故城 Q 遗址跨学科项目的研究报告，揭示了该遗址作为佛教朝圣者们“圣地”的意义。

(9) Deeg, Max: 《边缘视角：关于榆林窟第 3 窟的一些补充思考》，载于 Meinert, Carmen and Henrik H. Sørensen 编：《中亚的佛教 I：施供关系，合法化策略，圣地和朝圣》，莱顿，波士顿：博睿出版社，2020 年，第 230–243 页。

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dc/f7/dcf76e85-94c4-4cdf-b5ba-4101f53ce0be/meinert_sorensen_2020_buddhism_in_central_asia_i_deeg_offprint.pdf

摘要：

本文讨论了榆林窟第 3 窟文殊普贤变壁画的一些细节，主要探究文殊变、普贤变所描绘的母题/人物与文本来源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一个是指《西游记》的原型玄奘；另一个是《华严经》中的善财童子。在讨论这两个人物时，我们着重于他们与壁画的主要人物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并尝试将他们置于更广泛的泛佛教叙事决海建国的传说背景下。

(10) Meinert, Carmen: 《中亚东部密教圣地的创造》，载于 Meinert, Carmen and Henrik H. Sørensen 编：《中亚的佛教 I：施供关系、合法化策略、圣地和朝圣》，莱顿，波士顿：博睿出版社，2020 年，第 244–271 页。

https://static.ceres.rub.de/media/filer_public/fd/cf/fdcf9c3e-95b6-47c8-8e4a-330d21b4476e/meinert_sorensen_2020_buddhism_in_central_asia_i_meinert_offprint.pdf

摘要：

密乘佛教在中亚东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传播可借由各种文本和图像资料追溯，在敦煌文书中的藏文写本中可以找到最早的传播例证——或可追溯至 10 世纪。在黑水城的西夏文和汉文写本中可发现密宗材料的再次传播，这些写本的创作年代始于 11 世纪，可能大规模制造于 12 世纪。笔者认为，正是来自于历任强势的西夏统治者（约 1038–1227 年）的王室供养才使得如此大规模的密教图像和仪轨实修的圣迹网络，特别

是藏传佛教风格的，得以有规划的创造。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笔者探究了莫高窟第465窟作为重要的密教圣地之一，不仅是莫高窟中唯一的密教洞窟，而且在其他西夏帝国密教图像艺术遗迹中也是重要的创作。